



● 作者/David Bickers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洪琬婷

理解中共新聯合部隊的

Understanding the Vulnerabilities in China's New Joint Force

取材/2021年第四季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4th Quarter/2021)

中共積極推動軍改以打造能與美國抗衡的現代化聯合部隊，但其極權專制且僵化的指揮架構，將可能成為其無法發揮戰力的致命弱點之一。

弱點

2019年10月1日，中共火箭軍官兵擔任中共「建政」70週年大閱兵的正步方隊。

(Source: Xinhua/Alamy Live News/Xing Guangli)



過去五年多來，中共政府對共軍採取大幅度改革作為。這項修正的幅度涵蓋全般(包含從戰略、兵力結構和科技的各項改變)，且依習近平的說法，其目的明顯在於打造一支可以「打勝仗」的聯合部隊。¹ 假如這項改革獲致成功，區域的鄰國和美國將會發現，中共這個領導階層已經展現行為日益霸道的「人民共和國」，變得比過去更加膽大妄為。雖然改革不必然保證會成功(事實上，中共過去多次軍事轉型嘗試都是以失敗收場)，但習近平確實運用了近乎前所未有的力量來推動改革。因此審慎方式是假定這項改革將會成功，並瞭解其所產生的後果及如何以最佳方式因應。

本文分析共軍各項改革作為與中共新聯合部隊

的弱點。第一部分分析共軍最高層機關「中央軍委會」的各項改變，以瞭解中共國家決策模式和軍文關係的背景條件。第二部分則探討共軍的組織再造，特別置重點於其新成立之「戰略支援部隊」及重組後的戰區層級組織。第三部分研析有哪些手段可以破壞第一、二部分所提之共軍弱點，進而擊敗這支新的聯合部隊。

本文預判改革後的共軍內部將存在四個重大弱點。第一，這支聯合部隊將採取高度集權的決策模式，而此舉將證明難以肆應大規模戰鬥行動的要求。第二，改革後的共軍部隊必須耗費極大力量來整合聯合戰區層級的多領域行動。第三，改革後的共軍缺乏投射、維持或指揮可達中共廣泛全球利益目的所需之各種戰力。而最後，共軍目前



2019年10月18日，習近平於湖北武漢接見聯勤保障部隊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Source: Xinhua/Alamy Live News/Li Gang)

也受限於缺乏實質作戰經驗。

「中央軍委會」改革與中共決策行為本質

即便以中共威權主義的標準觀之，習近平所展現的仍是高度集權決策行為模式。在例行治國行為中，過去必須採取一連串的談判、交易和共識凝聚，才能完全動員中共的整個政治體。但在危機時刻，此種山頭林立且有些鈍重遲緩的體系，通常都會轉變為偏向集權式、獨斷專行的體系，以展現更強力的意識型態決策行為，亦即決策過程明顯是由共黨高層首腦完全掌握，從而嚴重限縮了原本下屬所具有可發揮的空間。² 此種危機指揮模式明顯見諸於從2003年中共處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2008年四川大地震，以及最近發生之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手法。此種危機指揮的典型特點，即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階層直接律定優先事項、國有媒體總動員、並且對較低階層黨員施加龐大壓力，要求其成功達成使命。但在習近平的時代，即便是例常性的治國行為亦具有這些危機指揮的特質。身為中國共產



近年來，共軍持續透過與美軍交流，並大幅度改革軍隊，期打造一支能致勝的聯合部隊。(Source: USN/Kevin V. Cunningham)

黨總書記的習近平，對於廣泛政策領域都掌握極不尋常的高度集權決策權力。其結果是國家政府機關逐漸習慣幾近十年的高度集權性指揮。

共軍和中國共產黨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依據中共《國防法》，共軍效忠的是中國共產黨，而非憲法或中央政府。共軍所有軍官都必須是黨員，而部隊中更編制有軍職政委來捍衛共黨利益。共軍雖然不直接負責內政安全，但在危機發生時就會扮演此種角色。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時，都必須靠共軍介入以恢復共黨

的控制。共軍雖然不希望執行此類任務(因為這可能會損及其聲望)，但其仍是共黨對付動盪和混亂的最後防線。

雖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和共軍之間共生共存的關係更高於共同利益。隨著時間累積，在體制面上的界線更明確，促成了功能上的差異和軍文精英階層二元化。³ 2013年時，某位前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曾在演說中警告，共軍必須「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⁴

在此種背景下，習近平改革中



央軍委會，並且意圖進一步加強對共軍的掌握，即使共軍原本就已經處於列寧式軍隊中典型常見的高度控制。身為黨國一體的機關，中央軍委會負責制定國防政策，並且執行平時與戰時的高層軍事指揮權。擔任主席的習近平，將委員從11員裁為7員，將軍種首腦踢出，重組各總部，並將某些職掌劃分給新成立的聯合參謀部。⁵ 釋出其作為陸軍大本營的責任後(陸軍成為與海、空軍平行的地面部隊司令部)，中央軍委會得以把重點放在習近平打造聯合部隊的優先目標和督導軍隊戰備及作戰。不是所有主席都能對其行使如此絕對

的控制權。事實上，過去中央軍委會還曾經有過其主席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不同人的情況(在胡錦濤任內有二年如此)，或是將權限下授給軍職的副主席。⁶ 然而，習近平在透過「主席責任制」領導後，就連例常性國防事務都提高到主席層級指導。⁷

整體而言，中國共產黨決策行為本質及其與共軍的關係就是一項弱點。首先，此種集權式體系在最高層次的戰略複雜狀況下可能會喪失功能。多數管理理論都認為，分權式決策行為最適合處理複雜狀況，但習近平將集權式決策行為常態化，剝奪了政府機關分權及授權經驗。各種

天然和公衛災難都已曝露出習氏政權的弱點，而戰爭也將必然如此。任何與中共的衝突都應設法製造最大量且最多元化的戰略挑戰，以打亂共黨使其難以有效管理戰爭。採取製造其內部混亂的手段並迫使共軍將注意力和資源集中於內部安全就是一種方法。第二，共黨和共軍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可列為打擊目標。兩者應視為各自分立的個體；縝密的目標處理(激化習近平及其軍事顧問群之間的矛盾，此由吳志遠[Joel Wuthnow]博士提出)有助於分化共黨和共軍並削弱中共指揮體系的整體團結。⁸



如要迫使中共加強關注內部安全，應設法讓中共領導階層重視其與共軍之間的矛盾，以削弱其整體團結。(Source: Reuters/達志)

戰區層級：結構與作戰面向弱點

共軍在其兵力結構上做出多項重大變革。陸軍成了最大輸家，被降為與海軍和空軍地位平行，而不再由中央軍委會各總部直接掌握。同時被提升為軍種層級的是原名「第二砲兵部隊」的「火箭軍」，其依然負責運用中共的陸基核武與傳統彈頭飛彈。而最後一項結構性變革則是成立了全新的「戰略支援部隊」，負責資訊領域的作戰任務



2021年2月14日，當時位於南海的美海軍之VFA-31「雄貓人」(Tomcatters)艦載戰鬥攻擊機中隊的F/A-18E型「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戰機在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航艦起飛。(Source: USN/Dylan Lavin)

(即中共「信息戰」的概念，包含網路戰、電子戰、情監偵及太空等領域)。

戰略支援部隊是瞭解中共未來戰爭行為的重要線索。觀察美軍遂行第一次波灣戰爭的過程，共軍點出了資訊科技與將之整合至聯合部隊至關重要。⁹ 此概念源自中共2014年軍事戰略「信息化局部戰爭」，而中共2015年版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更進一步將資訊提升為「主導角色」，而非僅是戰爭行為的一項「重要條件」。¹⁰ 在此概念下，共軍希望將軍事行動的主要重點置於海上與空中領域，同時搭配網路空間、太空及涵蓋整個電磁頻譜的行動。此種概念發展及其戰略意涵，正是共軍後來推動戲劇性結構變革的起源及理由。

對於共軍聯合部隊而言，將資訊科技融入作戰行動的能力，應為西方世界的成功手段；戰略支援部隊在此項整合任務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其發展將會是中共能否實現資訊戰願景的重要指標。

戰略支援部隊扮演關鍵角色的方式，是整合原本分散於共軍數個不同部門(包含總參謀部在內)的能力。其整合過去總參「第三部」的網路間諜和技術偵察、「第四部」之網路目獲與攻擊、以及「信息化部」所具備資訊系統防護能力。此一架構讓戰略支援部隊可以從事「整合式偵察、攻擊與防護」的廣泛網路行動。戰略支援部隊是支持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行動的樞紐。雖然許多陸基傳統彈頭打擊武器設備歸屬火箭軍，但所有情報、監視、



目標獲得及飛彈導引等，都得依賴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也須支持共軍在東海和南海的兵力投射作為，因為海上和戰略空中部署所必須的所有太空監視、衛星中繼與通信、遙測、追蹤及導航等都由戰略支援部隊掌控。¹¹

習近平推動軍改的另一項重要目標是將共軍澈底轉型為一支完全的聯合部隊。為了打造中共的聯合部隊，原本主導共軍的陸軍被降格為與海軍和空軍平行地位。共軍兩大層級建立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分別為直屬中央軍委會的聯合參謀部，以及將七次行政軍區重新編組為五個聯合戰區。過去一直由各軍種掌握的指揮權，現在劃歸這些戰區，各軍種目前只負責行政任務（諸如裝備和人力議題）。¹² 共軍為能進一步展現其落實聯合部隊的企圖，在五個戰區司令員中，有兩位司令員已非陸軍軍官。¹³

新的聯合戰區體系，理論上可以提高中共的備戰能力。過去的軍區並非戰時指揮部（相反地，是由中央軍委會編組臨時性戰區）；然而，新戰區擁有平時和戰時的指揮權，意味著其平戰轉換

可以無縫接軌。¹⁴ 各戰區都被賦予一項主要任務（「東部戰區」仍然負責臺灣和東海；「南部戰區」負責南海和與東南亞各國的邊界；「北部戰區」負責朝鮮半島；「中央戰區」則負責防衛北京）。¹⁵ 各戰區負責將訓練方向導向作戰時可能行動。¹⁶ 這意味著蒐集東部和南部戰區的各項演訓情報，可以歸納出共軍對臺灣、東海和南海應急作戰行動的脈絡。

就資料上來看，這些改革應該可以將共軍轉型成為聯合部隊、提高從事戰爭的整備，並且讓太空、網路和電磁領域的軍事行動成為優先重點；實際上，這項改革可能會遭遇許多重大阻礙。首先，典型中共威權主義山頭林立情形，最後必將使改革受挫。然而，一份分析中共過往軍事戰略轉型的報告顯示，最能確保改革成功的兩大因素，即衝突本質的巨大改變與共黨高度團結，均已到位（強調透過關鍵資訊科技和習近平的集權式指揮所達成）。¹⁷ 第二，是普遍存在於任何大型結構變革中的組織摩擦。這些緊張關係，可能導致改革須耗時多年才能達到優化作

戰效能（某位評論員認為，2030年可視為實際可達成目標）。¹⁸ 其亦可能證明，共軍在改革完成並且對其新建聯合部隊具備充分信心前，不太可能積極展開攻勢行動。

即便這些組織障礙都能克服，共軍經歷改革後仍然存在某些結構性弱點。第一項是陸軍執行戰區層級多領域作戰的能力。各戰區司令部都只編配陸軍、海軍和空軍部隊。火箭軍的指揮管制仍為高度集權，原則上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駐防於各戰區的火箭軍導彈旅。¹⁹ 戰略支援部隊的戰力也直接受中央軍委會管制（極可能透過聯合參謀部指揮）。²⁰ 結果可能導致傳統領域（地面、海上和空中）、非傳統領域（太空、網路和電磁頻譜）及飛彈部隊（包含傳統和核武飛彈）之指揮方式出現大幅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變成戰區部隊在整合聯合訓練及戰時全領域作戰效能之阻礙。以負責對臺作戰的「東部戰區」司令員為例，其實際規劃和執行聯合地面、海上和空中戰場效應；但在聯合太空、網路和電磁頻譜等方面，卻必須與戰略支援部隊相互協調，而飛

彈作戰則須與火箭軍協調。此種安排對期程較短的作戰行動或可適用，但在長期、高強度對抗實力伯仲敵人的戰役中，缺乏更完善授權與分權的指揮模式，共軍要取得勝利仍屬困難。

第二項結構性弱點則是改革後的共軍仍然無法投射、維持及指揮部隊，以確保其遍及全球的中共利益。自從習近平於2013年啟動「一帶一路計畫」後，這些符合中共利益的項目和地域範圍也隨之大幅增加。然而，共軍並未擁有在東亞以外地區作戰的兵力投射能力；而相較過往，中共海軍雖然更常派遣到亞洲以外海洋地帶巡弋，卻仍無法保護「一帶一路」所有基礎設施的海上交通全線。共軍仍得耗時數十年擴張其航艦攻擊打擊能力，始能跟上美海軍的航艦戰力。²¹

共軍也無法有效支持海外軍事行動。2017年，共軍在吉布地設立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以支持其在亞丁灣的海上行動。²² 共軍總後勤部部長曾撰文支持設立更多海外據點，但卻無證據顯示中共採取此類作為。²³ 此外，共軍戰略運輸能力存在諸

多缺陷，不僅限制了在區域之外部署兵力的能力，也阻礙其於中國大陸各戰區之間遠距調動兵力。²⁴

就指揮海外作戰行動來說，戰區職責僅限於中國大陸境內和鄰近區域，全球行動的指揮權仍是由中央軍委會透過聯合參謀部所掌握。²⁵ 舉例來說，這種安排意味著儘管東部戰區在對臺作戰時可以管制海上作戰，但西太平洋與中共海軍有相關的深遠作戰是由聯合參謀部指揮。

習近平推動的共軍改革作為與美軍依1986年《高華德尼可斯國防部組織改組法》(*Goldwater 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所執行的指揮結構變革有明顯相似之處。然而，事實上共軍可能正採用一套美軍已然發覺具有缺陷的類似結構，尤其是在其整合全球軍事行動能力方面。美軍的全球戰役與應變計畫，必須透過任務指名將官(通常是由一位地域性與功能性聯合作戰司令擔任)，來協調所有地域與功能性聯戰司令部的全球戰略資源。然而，部分人士認為這些將官所

獲得之權限，並不足以有效執行這些計畫。²⁶ 美軍應採取所有必要方法，改善其整合全球軍事行動的能力；透過橫向擴大任何區域衝突以阻礙中共境外投射的能力，也是美軍必須確保的競爭優勢之一。

中央軍委會集中控制與掌握的責任項目則是另一項弱點。中共軍改後的指揮安排，已然成為中央軍委會在戰時必須負責指揮及協調多個戰區相互支援、維持對火箭軍以及戰略支援部隊的直接指揮權、協調各戰區的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任務行動，以及直接指揮所有超出中國大陸鄰近地區的海外軍事行動。下授戰區之責任不足的影響在於，中央軍委會可能會在橫向與縱向擴大衝突中，發現其身陷難以抗衡敵人的窘境。

改革後共軍的弱點因缺乏有意義的聯合作戰經驗而更形嚴重。共軍前次投入大規模衝突之時間點是在1979年「中」越戰爭時；在那場衝突中，居劣勢的越南軍隊竟然擊敗了數量優勢的中共軍隊。²⁷ 如果再更回溯至1955年，可以瞭解共軍首次和最後一次聯合作戰(共軍攻擊並占



領一江山)。²⁸ 目前共軍有兩種方式可在非實戰情況下培養作戰經驗。第一是藉由嚴格且真實的聯戰訓練。共軍演習的規模、複雜度和次數在過去十年間已大幅增加。然而，目前尚無明確跡象顯示，此種成長幅度與有效聯戰訓練之間的正向關聯。以2015年某次演習為例，參演部隊是採相互對抗而非並肩作戰。²⁹ 儘管如此，觀察共軍訓練的範圍，會是瞭解其陸軍聯合作戰能力發展的有效指標。

共軍第二種培養經驗的方法，是透過累積相對規模較小的海外軍事行動執行經驗(例如災害救援與國際維和行動)。中共參與聯合國部署任務以及其於2011年成立「非戰爭軍事行動研究中心」，顯示出其已採取類似作為，正如同其亦投入與其他國家(包含美國)共同實施之多次災難救援訓練演

習。³⁰ 美軍及其盟友必須注意對共軍的職能傳授，即便是那些表面看似無害之領域；因此種訓練可能會成為中共在強化聯合部隊能力時的敲門磚。

打亂並擊敗共軍聯合部隊

美國以及其他憂心中共威權本質的國家，應對可能會變得更為強大的共軍保持警惕。為能在未來對抗中擊敗這支軍隊，美軍必須瞭解其目前仍處於衝突的形塑階段。因此現在就必須採取相應手段，深入瞭解並打亂共軍改革步調，並且鎖定其制度中各種不同面向的弱點，未來才得以擊敗共軍。

為了更深入瞭解共軍，情報蒐集應觀察中共在國家層級的危機決策行為本質。從自然與人為災害事件中，可以獲得與安全危機事件同樣多的線



2021年6月14日，美陸戰隊第31陸戰遠征支隊的UH-1Y型通用直升機，從航行於東海的紐奧良號(USS New Orleans)兩棲船塢運輸艦起飛，準備和美利堅號(USS America)兩棲突擊艦及日耳曼城號(USS Germantown)船塢登陸艦共同實施海上進階訓練課目。(Source: USN/Desmond Parks)



索。必須確認中國共產黨和共軍之間出現分歧的領域，以便於未來善加利用。必須更深入瞭解共軍兵力結構演進，尤其針對聯合參謀部、戰區、戰略支援部隊和火箭軍間的指揮關係。最後，監控共軍各項演訓，以追蹤共軍在聯合部隊作戰能力的成長情形，並辨識出針對臺灣及中國大陸周邊海域展開的作戰應變行動。

目前有數種方法可以打亂共軍的改革步調。其中之一是阻止共軍達成其計畫的科技目標。先進科技發展對共軍實現其改革極具重要性。習近平公開承認此項事實，並將其納入其規劃的軍民融合戰略的核心項目，希望透過全面科技發展，大幅提升軍民統合力。軍民融合戰略希望結合過去互不相關的各種民間和軍隊研究發展計畫，以推動更具統合性之作為，意圖創造「跳躍式」發展。³¹ 這意味

著軍隊需求項目已被列入國家計畫作為的最高層級。

舉例來說，中共「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就將軍民融合列為其「六個方面重點任務」之一。³² 軍民通用科技在軍隊作戰中早已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運用「高分四號」衛星支援共軍遠距精準打擊獵殺鏈。³³ 戰略支援部隊尤其需要軍民融合戰略，以促使中共商業界協助共軍改善其軍事指管通電情監偵系統；其已和九個研究機構簽署合作協議，並且與民間企業建立非正式關係。³⁴ 西方世界可以預期戰略支援部隊將利用各種新興科技(人工智慧、量子運算和太空情監偵系統)來達成其目的。若能成功發展將使共軍擴大其擊殺鏈的範圍和殺傷力，甚至可以涵蓋第二島鏈，從而使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可以採取更為強勢的作為。

國際間應培養與維繫印太地區的聯盟和夥伴關係，並在必要時共享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圖為2018年7月22日，東加武裝部隊、澳大利亞陸軍以及日本海上自衛隊於美軍夏威夷波哈庫洛亞(Pohakuloa)訓場參與環太平洋軍演。(Source: USN/Kelsey J. Hockenberger)





西方世界的所有決策高層和民間企業都必須瞭解，中國大陸的民間和軍事部門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和中國大陸民間企業打交道時，事實上就是和共軍的代理人做生意。中共在負責敏感國家安全領域的西方科技公司所進行的各項投資，都應嚴密予以監控，甚至必要時加以限制。尚未有法規得以採取行動的政府，則應著手起草並通過這類法規。

培養與維繫印太地區的區域忠誠聯盟和夥伴關係，並且在必要時共享反介入/區域拒止戰能力，將可讓中共升高情勢的作為複雜化，削弱其透過相對安全之作戰演練來補足共軍缺乏實戰經驗之能力。結合機動兵力運用、部隊輪調、前進駐軍及擴大管道、基地設置與領空飛越協定等，將可進一步促成此目的。此外，美軍應確保其不會在無意間幫助共軍培養其聯合部隊專

業能力，即便透過諸如災害防救或撤僑行動等表面良善事項，避免此種學習被轉用於更具侵略性的用途上。

一旦進入正面交鋒，在其國家決策模式高度集權本質的限制下，共軍將很難應對一場複雜、持久且快節奏的安全危機。中央軍委會將會遭遇使其瀕臨崩潰的壓力。因此必須挑起多重外交、經濟和安全危機，包含其內部動盪，使共軍被迫投入內

註釋

1. Joel Wuthnow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ntroduction," in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ed. Phillip C. Saunders et al.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19), 1.
2. Sebastian Heilmann, ed.,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158.
3. Michael Kiselycznyk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 2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10), 1.
4. Quoted in David M. Finkelstein, "Breaking the Paradigm: Drivers Behind the PLA's Current Period of Reform,"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50.
5. Wuthnow and Saunders, "Introduction," 11.
6. Andrew Scobell, "China's Evolv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reeping Guojiahua," in *Chinese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d. Nan Li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Joint Force Quarterly* 82 (3rd Quarter 2016), 72.
8. Joel Wuthnow, *System Overload: Can China's Military Be Distracted in a War over Taiwan?*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 15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20), 27.
9. Edmund J. Burke and Arthur Chan, "Coming to a (New) Theater Near You: Command, Control, and Forces,"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229.
10. M. Taylor Fravel, "Shifts in Warfare and Party Unity: Explaining China's Changes in Militar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no. 3 (2018), 80–81.
11.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446–455.
12. Heilman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152.
13. 兩人分別為「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海軍上將(時任中將)和「中部戰區」司令員乙曉光空軍上將。參見Shane A. Smith, Thomas Henderschedt, and Timothy D. Luedecking, "Reverse Engineering Goldwater-Nichols: China's Joint Force Reforms," *Joint Force Quarterly* 90 (3rd Quarter 2018).
14. Jeffrey Engstrom, "China Has Big Plans to Win the Next War It Figh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9, 2018.
15. Wuthnow and Saunders, "Introduction," 8.
16. Mark R. Cozad, "Toward a More Joint, Combat-Ready PLA?"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215.
17. Fravel, "Shifts in Warfare," 83.

部維安。透過對中共周邊多個要點造成威脅的行動，橫向擴大情勢將限縮中央軍委會協調不同戰區的能力，並凸顯共軍在不同戰區調動兵力的不足之處。深遠作戰將限制共軍整合全球行動與確保全球利益的能力，讓中央軍委會被迫承擔更大的決策負荷。各項軍事行動也必須製造最高程度的全領域威脅，利用中央軍委會在網路、電子戰和太空戰力缺乏授權的弱點，讓此負

荷更形沉重。中國共產黨和共軍的分歧，應透過針對性資訊戰使其惡化，以削弱中共指揮的嚴整性。這些效應還應藉由對中共體系發動多重精準打擊以擴大效應，優先破壞中央軍委會與其聯合部隊，以及戰略支援部隊戰力（因其為中共作戰概念中的作戰重心）的通信節點。

一個在日益強大國家支持下成功改革的共軍，將成為一支強大的作戰武力，但如同其他作戰

系統，其亦有弱點能加以攻破。就中共新建立的聯合部隊而言，不完全的戰區授權方式以及中央軍委會仍然高度集權控制就是一项嚴重弱點。

作者簡介

David Bickers上校現任英國內閣辦公廳國防政策顧問。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18. Burke and Chan, "Coming to a (New) Theater Near You," 246.
19. David C. Logan, "PLA Reforms and China's Nuclear Forces," *Joint Force Quarterly* 83 (4th Quarter 2016), 60.
20. Ibid.
21. Andrew Scobell and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The Flag Lags but Follows: The PLA and China's Great Leap Outward,"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180.
22. Burke and Chan, "Coming to a (New) Theater Near You," 279.
23. Andrea Ghiselli,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Organisational Preferences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Debate on MOOTW,"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3, no. 3 (2018).
24. Michael S. Chase et al.,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5).
25. Smith, Henderschedt, and Luedecking, "Reverse Engineering Goldwater-Nichols."
26. Daniel Sukman, "Global Contingency Plans: A New Look at War Planning," *Military Review* (2019), 115.
27. Timothy R. Heath, "China's Untested Military Could Be a Force—or a Flop,"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7, 2018.
28. Ian Burns McCaslin and Andrew S. Erickson, "The Impacts of Xi-Era Reforms on the Chinese Navy,"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138.
29. Ibid., 140.
30. Ghiselli,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Organisational Preferences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31. Brian Lafferty,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PLA Reforms," in Saunders et al.,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632–635.
32. Lorand Laskai, "Civil-Military Fusion and the PLA's Pursuit of Dominance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China Brief* 18, no. 6 (2018), 13.
33. James S. Johnson, "China's Vision of the Future Network-Centric Battlefield: Cyber, Space, and Electromagnetic Asymmetric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Strategy* 37, no. 5 (2018), 378.
34. Laskai, "Civil-Military Fusion and the PLA's Pursuit of Dominance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14.